

西方游记汉学的奠基之作

——《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价值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089)

【内容摘要】从历史上看,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有多部,但西方关于东方游记中没有任何一本游记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游记》是外文文献中对蒙元帝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词,记载有不实之处,但绝大多数的记载都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游记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蒙元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蒙古帝国的真实画卷。而且,该游记还起到了拓宽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激发欧洲的世俗观念、催生近代地理大发现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游记汉学;《马可波罗游记》;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DOI:10.14185/j.cnki.issn1008-2026.2017.08.007

一

西方汉学大体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大的时期。这种划分并不很精确,因为,在今天专业汉学的时代,游记汉学作为一种记事形态和文本仍然存在。但从西方汉学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来看,这种划分仍可以使用。

从历史上看,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有多部《伯郎嘉宾蒙古行纪》《卢布鲁克东行纪》等等,但西方关于东方游记中没

有任何一本游记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中国和欧洲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将中国和欧洲分开,北方的大漠千里黄沙无人烟,除了蒙古人的铁骑外,历史上很少有人越过。相隔就有眺望,眺望是一种幻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和中国通过那仅有的联系,在相互的遥望和幻想。《马可波罗游记》就成为欧洲人对东方最早的遥望与幻想。

这位因东方而致富的百万富翁从

此成为整个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在中世纪牵动了那么多西方人的心?我们必须将其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威尼斯富商尼柯罗·波罗之子。在他出生不久,其父和叔父马菲奥曾到过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经商,后因钦察汗国的别儿国和伊利汗国的旭烈兀之间发生了战争,他们俩在回国途中偶遇旭烈兀派回元朝的使臣,便阴差阳错地随着使臣到了元大都,见到了忽必烈。后受元世祖之托,担负起了元朝派往罗马教廷的特使,忽必烈希望他们从罗马带回100个精通各类学问的传教士。1271年15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叔,带着罗马教廷给忽必烈的复信,踏上了重探契丹之路。历经千险万苦后,终于在1275年到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从此,一家三口在中国住了下来,一住就是17年。元世祖喜欢聪明伶俐的小马可,邀他一起狩猎,一起品酒,还派他做元朝的外交使臣,地方官员,可谓官运亨通。

1289年伊利汗国的阿鲁浑丧妻,派使者来元朝求婚,想娶一个真正的蒙古公主。忽必烈将卜鲁罕族的阔阔真公主选中,当阔阔真公主随使者返回伊利汗国时,马可·波罗一家三口也随公主返回欧洲。1291年他们从泉州起航,经南

海、印度洋、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告别阔阔真公主后,三人从陆路返回家乡。

1296年在威尼斯和热亚那的海战中,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狱中。狱中的孤独和郁闷使他和早在狱中的比萨小说家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很快成为朋友。马可·波罗东方周游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鲁思梯切诺,两人都感到相见恨晚。于是,一个讲,一个写。一部轰动世界的东方游记就这样在1298年完成了。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他名声大噪,不久便以多种文字出版,此书成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一百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认识中国历程中里程

碑性的著作,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他的书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1]。

二

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靠的,尽管有些不实之言,但他们一直把《马可波罗游记》做为研究蒙古帝国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2]。近年来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的观点再次出现^[3],作为学术研究这是正常的现象。笔者认为从学术上来看,这本书基本是属实的,如杨志玖先生所说:“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4]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第一次从中国文献中找到和《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应的文献,证实了马来华的真实性,当年向达先生认为杨志玖的文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5]。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不实之词,但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蒙元时代的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果一个人没到过中国,不是亲身经历,几乎不可能写出这样的

内容。所以如杨志玖所说:“不管马可本人和其书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但总起来看,还是可靠的。他的书的真实性是不容抹煞的。他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应该承认的。他是第一个横穿亚州大陆并做出详细记录的人,对中国的内地和边疆,对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土特产品、轶闻奇事,一一笔之于书,虽朴实无华,但生动有趣。在他以前和以后来华的西方人留有行记的也不少,在文才和对某一事件的记述方面也许远胜于他,但像他这样记事之广、全面概括的著作绝无仅有。”^[6]

如果同马可前后的游记相比,《马可波罗游记》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蒙元帝国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介绍。

在马可·波罗时代对蒙元帝国介绍最详细的鄂多立克的游记,但如果将《马可波罗游记》的游记和他的游记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鄂多立克的游记都无法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比。如对大都城及大汗的介绍,鄂多立克仅用了5页纸,而马可波罗却用了14章,43页。

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元代两次重大的内部政治斗争,一次是乃颜的叛乱,一次是阿合马事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这两次事件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他描绘了平叛乃颜的战斗及将乃颜

处死的过程,而他所讲的阿合马事件和《元史》的记载基本相符^[7]。另外,他对元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的介绍都十分详细。

例如,元代的政治制度是行省制,驿站制和槽运制是元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马可在游记中对这三种制度都做了详细的介绍。《马可波罗游记》明确指出当时元朝共有12个行中书省,“全国有驿站一万多个,有驿马二十多万匹,有陈设豪华的驿站系统宫殿一万多座”。他对瓜洲在元朝槽运系统中的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说明:“朝廷中必须之谷,乃自此地用船由川湖运输,不由大海。”马可对元朝时的驿传制度极为赞叹,认为:“大汗的这一切事物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为出类拔萃。”而这点并不是夸张,因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它当时建立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站赤”制度。

《马可波罗游记》中专有一章介绍了元朝的的纸币,纸币成为元代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必须,“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之死也”。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260年元朝开始发行纸币,有以文计算和以贯计算的两大类近十种不同面值的纸币。

在讲到汗廷的宫殿时,他说:“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唯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

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8]

马可对大汗每年的节日庆典的介绍非常具体,不是亲身参加者,不可能如此记述。研究游记的专家沙海昂认为马可的记述“与当时中国著述所记相符”^[9]。甚至连大汗的私生活他也了如指掌,大汗从弘吉剌部每年招来美女“命宫中老妇与之共处,共寝一床,试其气息之良恶,肢体是否健全。体貌美善健全者,命之轮番待主。六人一班,三日三夜一易”。仅此,便可知他对宫廷了解之深入。

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游记》是外文文献中对蒙元帝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不少地方有夸大之词,记载有不实之处,但他的绝大多数的记载都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游记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蒙元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蒙古帝国的真实画卷。

马可在中国居住了17年,足迹几乎踏遍中国,他到过的地方有:哈密州、肃州、甘州城、涿州、太原、关中、成都、建

州、云南丽江府、金齿州、叙州、新州、临州、淮安、高邮、泰州、扬州、瓜州、镇江、苏州、福州、泉州等,这样他对中国的报道在内容上已经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时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报道,这种广度是同时代的人所没有的,如鄂多立克也曾介绍了中国江南的富人的生活,但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和马可波罗相比。马可描述西安城:“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昔为一国,甚富强,有大王数人,富而英武。”^[10]在讲到杭州南宋的宫殿时,他说:“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环以具有雉堞之高墙,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11]

作为一个商人,他对中国的民俗十分感兴趣。他说鞑靼人用十二生肖记年,显然,这实际上说的是汉人的一种风俗;还提到利用属相来算命,这种风俗在中国早有之;在游记中多次提到汉人的丧葬礼俗,“人死焚其尸。若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于尸后,在偶象前做丧歌,乃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冑金锦等物并共焚之”。在游记中他还多次介绍中国各地的饮食,从蒙古的马乳、骆驼奶,到南方的米甜酒、

药酒、葡萄酒各类饮料都提到;他既参加过宫廷的国宴,也参加过在民间的“船宴”,上至王宫贵族的饮食,下到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做了描写。他的这些描写展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当然,在他赞扬中国人的孝道时,他“从未提及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孟子的名字,甚至也未曾提起朱熹的名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汉语一窍不通,但同时,他对哲学思想又是何等的无动于衷”^[12]。

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 的历史文献,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西方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翻过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后。但它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仅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其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如果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必须使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13]。而这种形象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冲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我们只

有在一种言说者的母体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所创造出的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发现“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14]。

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文艺复兴中才大放异彩的。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它的影响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这一点。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在中世纪时“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之语言和形式中”^[15]。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上都是意大利所写的,马可这个威尼斯的富商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它遥远而又神秘。这样欧洲的时空就大大扩展了,大汗的宫廷,行在的湖水,扬州的石桥都进入了他们的想象之中。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的世界观念就被突破,罗马再不是世界的中心。它“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以致不敢相信”^[16]。在14世纪“欧洲

某些思想活跃的人开始按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知识塑造其世界观;早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从前以欧洲和地中海为界的视阈展宽了,它包容了世界上大片新的地区。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的世界地图就是马可·波罗的地理学的一个体现,它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7]。

其次,《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18]。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这种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马可波罗游记》满足了意大利人所有这些冲动,大汗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契丹的每座城市都远比威尼斯富饶。东方的女人美丽动人,奇异的风俗可以使你在契丹永远享受少女的欢乐。“契丹的出现,它立即就成了西方文化表现被压抑的社会无意识的一种象征或符号。他们不厌其烦地描绘契丹的财富。无外乎是在这种表现中置换地实现自己文化中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表面上看他们在谈论一个异在的民族与土地,实质上他们是在谈论他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世界。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契丹形象,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解放力量”^[19]。《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所梦幻新生活

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而这位意大利的水师提督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最热心读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的塞尔维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存放着他当年所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其实,当时迷恋着契丹的绝不仅仅是哥伦布,意大利的地理学家托斯加内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也是一位着迷契丹的人。他自己画了一张海图,认为从里斯本出发越过2550海里就可以到达刺桐港。

他在给哥伦布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富饶的契丹,他说:“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其国人口殷庶,富厚无比。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可以数计。皆臣属大汗(Great Kan),拉丁语大皇帝也。都城在契丹省。”^[20]哥伦布在漫漫的航海途中,面对重重困难,但他坚信托斯加内里的判断,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战胜全部苦难的动力。当大西洋上的海风把他的船队吹到美洲的小岛时,他还认为自己发现的是契丹,他要“去行在城,把陛下的亲笔信件交给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带给国王陛下”^[21]。

契丹的财富不仅吸引着哥伦布,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斯蒂利斯(Castilian)也渴望着遥远的财富。他和哥伦布签了一个协议:授予他贵族头衔,任命他为所有发现的地方的元帅,并可以祖祖辈辈继承,他还拥有所有他发现的地方的所有财富的十分之一,并一律免税,甚至他可以向他发现的地区的所有船只征收八分之一的税。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东方,似乎哥伦布一到达那里就可以腰缠万贯,富比万家。他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和对契丹财富渴望的西班牙国王一拍即合,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契丹大汗的信,带着《马可波罗游记》给他的梦想,他将出航去寻找契丹,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船队经过三十多天不见陆地的航行,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巴哈马群岛。在岛上他们见到了印第安人,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新石器时代,男女老少都一丝不挂。哥伦布认为这可能是亚洲的边缘地区,称它为大印度地区。10月28号他们发现了古巴,惊奇地看到了男女老少都在抽烟,很舒服。西班牙人很快学会了这个习惯,并把它传向了全世界。哥伦布认为古巴这个穷地方一定是契丹最荒凉的地方,契丹决不是这样。他认为马可波罗所说的那香料堆积如山的刺桐港一定会发现。1493年3月15号哥伦布返回出发的西班牙港口帕洛斯,244天

的远航结束。哥伦布向人们宣称,他已经找到了契丹。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时,哥伦布名扬天下。

实际上哥伦布至死仍坚信他所发现的国家就是亚洲的东海岸,就是契丹。“这种信念在哥伦布死后二十余年仍未销声匿迹”^[22]。甚至在后一个世纪中,当中国已经确定是契丹后,仍有西方的航海家们不死心,如英国的许多探险家,他们仍然将契丹作为寻找的目标。《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正如拉雷在《英国十六世纪航海史》一书所说:“探寻契丹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灵魂。”^[23]

1603年耶稣会士鄂本笃第一次证实了“契丹”就是“中国”。他死后,墓志铭上刻着“探寻契丹却发现了天堂”。对哥伦布来说是“寻找契丹却发现了美洲”,实际上发现了新世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注释:

[1][4][16]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第8、8、223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1938年伯希和和穆尔出版了英文的整理版,后伯希和自己又出版了《马可波罗注》,著名中西交通史研究专

家裕也出版了自己的注释本。

[3] 王育民:《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载《史林》1988年第4期;吴芳恩:《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5]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12期;向达文见余士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68页,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6]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第38-39页,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参阅《元史》卷158《许衡传》。

[8][9][10][11]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201、355、266、352页,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2] [法]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119页,许钧、钱林森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法] 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18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法] 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6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18]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79、445页,何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7] [英] 蕾蒙·道森:《中国变色龙》第28-29页,常绍民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19] 周宁:《契丹传奇》第205页,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20]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439页, [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版。

[21] 刘福文等译:《哥伦布美洲发现日记》第64页,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 [英] H. 裕尔撰, [法] H. 考迪埃修订:《东域记程录丛》第143页,张绪山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3] 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18页,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